

王 灿 著

By Wang Can

《尚书》历史思 研究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王 灿 著
By Wang Can

《尚书》历史思想 究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尚书》历史思想研究 / 王灿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3. 8

ISBN 978 - 7 - 5161 - 3215 - 9

I. ①尚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《尚书》—研究 IV. ①K221. 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13737 号

出 版 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顾世宝
责任校对 王雪梅
责任印制 张汉林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(邮编 100720)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中文域名: 中国社科网 010 - 64070619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21
插 页 2
字 数 352 千字
定 价 59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 - 6400979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《尚书》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典之一，相关的研究成果自汉代以来便日积月累，以至汗牛充栋。各家的研究有通解通释，也有专论专考，着眼点不同，类例亦各异，但都或远或近、或多或少地涉及《尚书》的历史观念或历史思想。现在一般称此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，似乎不把它当作历史著作来看，实则相对于先秦学术的发展历程和真实水准而言，未尝不可把它看作当时史学的高端作品，或者径认为它就是中国史学的开山之作。书中所包含的历史思想是既丰富又具体的，而且是多向度、多层面的。王灿博士的学位论文以《〈尚书〉历史思想研究》为题，欲求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有所发明和创新，这不论在思想史还是史学史、史学理论的研究方面，都应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。

谈《尚书》的历史思想，自然不能脱离中华民族对自身早期历史的看法。中华民族是个巨大的民族文化共同体，先秦时还率称华夏，覆盖众多的族群。我以为先秦学术史上有关华夏民族起源和演进的种种历史观念，现在可以统称为华夏史观；与此相对的是各部族以自身族类记忆的形式展开的历史观念，现在可以统称为部族史观。部族史观多可追溯到传说时代的神话与史话，其中也包含了若干华夏史观的初始因素，并成为日后华夏史观整合与进化的思想基础。这种整合体现在典籍的记录中，《尚书》是最古且最有典型性的。先秦学者著书立说，已多援引《夏书》、《商书》和《周书》，概括的引用则只称之为《书》。现存的《尚书》按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的顺序编辑，便极其鲜明地展示出华夏民族追述自身历史的大脉络和大框架，体现出早期华夏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基础结构。此种严肃的断代观念和分期系统超越于上古部族史观之上，透露出强烈而清醒的“大一统”国家意识和华夏“正统”观念，标志着华夏历史意识到春秋战国时代已完全成熟。这中间蕴含着一系列民族融合、政治变动、

文明进化、共同体的认知等机制，都是和历史思想相关联的。特别是此种追述所显示的历史连续性观念，表明华夏文明是个原生型的有着独特发展道路和普遍性格的连续体，从来没有中断过。这一观念深刻在古人的意识中，不仅是华夏史观的核心构成部分，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支柱之一。此外，“断代”编辑的方式注重历史源流，也强化了《尚书》自身的文献价值，使之成为后世古典政治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、思想史、文献文化学等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。宽泛一点说，先秦“六经”所保存的集体的历史“记忆”和寄托于追祖敬宗、报本返始的寻根意识，都体现出华夏民族统合与文化整合的历史背景。这点在《尚书》中尤为鲜明，故而今天的研究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。

历史学上的本体论，强调对历史本身的思考和体认，理应成为一切史学思想的基石。中国式的历史思想，自先秦时围绕恢宏的华夏史观逐渐展开，即已涵括诸多独具特色的分命题。天人关系是绕不开的，司马迁所说的“究天人之际”，大约至迟自西周以来，便成为华夏史观所关注的一条主线；其间总的趋势是从“神本”走向“人本”，上升到历史观上也就是轻“天命”而重“人事”，将历史本原问题从天界拉回到人间。与此相应的是摆脱“神创”意识的文明进化史观，如《易传》所标称的“圣人”作八卦而“制器尚象”的理论，实际是一种由器物制度而抽象出来的反向构筑的学说，“圣人”的概念已无异于指称文明进化的代名词。另一条主线是历史运动问题，先秦经典学与诸子学都承认历史是变动的，不是静止的，是辩证发展的，不是平直运行的，其中包括现在所称的进化论、循环论等历史思想的因素，甚至不乏所谓“倒退史观”的说法。问题集中于不同时代的治道之变化，有关王道与霸道、常道与变道、直道与圜道，以及“先王”与“后王”、“稽古”与“革命”、“兴灭”与“继绝”、“忧患”与“殷鉴”等的论说不绝如缕，都显示出古人历史思想的复杂性。治道观不妨说就是一种现实性的历史观，而相因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，其基本指向是道德致治，“为政以德”被认为是高于一切的普世价值，是建立全社会名分秩序的关键之所在。由此便造成儒家“内圣外王”的思想路线，这一思想路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表述为一种“道德史观”。今以华夏史观言之，上述各点都可说是它原生而特有的要素，都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以上简单提示，王灿博士在他的论著中差不多都已有初步的论说。这

些论说是围绕《尚书》的记录展开的，但所用史料不限于《尚书》，也涉及其他经典和诸子的著作，并对各家的历史思想有些附带的阐述。他在学期间读书极用功，古今中外涉猎甚广，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，而于近代以来研究《尚书》的著作和论文检阅尤多。这为他的学业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史料基础。同时他注重由考证入手作义理的思考，深入发掘，力求出新，勤于撰述，仅在读博期间及毕业后的几年内，已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，多有创获。其学位论文经过反复修改，日趋扎实，自成一体，现在得以出版，正可成为个人治学的一个新起点。

《尚书》的流传过程极为复杂，现存文本的“古文”部分，大抵自清代以来就被谥定为伪书。其实所谓“一分真伪，而古书去其半”的说法，不免有些夸张，近些年接连由地下出土的一些古代简帛书，证明好多曾被判为伪书的本子并不伪或不全伪。《尚书》是很早就已成书的古经典，虽有流传过程中的种种问题，乃至后人的改窜，而要说如此多的篇章皆为后人伪造，有些不近情理，况且前贤的辨伪方法也不无可议之处。古籍的流传，要求一字一句都永远保持原样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校勘学也不是描红式的影抄。《尚书》的“古文”部分，假如有些是从先前经师的讲解本整理来的，那么遣词造句就有可能与原先的文本大有差异，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它们的来历。今古文之争是有学术来由的，相关的研究工作自然也有必要，而且这点也会影响到史料的运用，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这些至今也并未威胁到《尚书》整体的经典地位。王灿博士的大著没有在这方面多作说明，这并不是说《尚书》的今古文就没有区别，只是专题研究它的历史思想，就无须在文字上多作纠缠，横生许多枝节反而会影响主题的探索。就《尚书》的基本价值和专题研究而言，将它的“今文”和“古文”一体看待，在学理上也未必不可。当然，必要的时候，也要顾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源流。

《尚书》历史思想的研究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，需要各方面人文学者的共同努力。王灿博士的大著，对他自己来说还只是个开头，精品的打造仍要付出更多的心力和精力。我相信他的大著有参考价值，可供各方面学者使用，故说了上面的一些话，权算个短序。

目 录

序	(1)
绪论	(1)
一 《尚书》文献源流简述	(2)
二 今本《尚书》文献界定	(5)
三 《尚书》历史思想研究现状	(11)
第一章 先秦史视阈下的《尚书》历史思想	(26)
第一节 《尚书》在先秦文化中的独特地位	(26)
一 《尚书》是先秦文化的文献源头	(27)
二 《尚书》在先秦历史思想中的地位	(31)
第二节 《尚书》历史思想的先秦文化印记	(34)
一 《尚书》的农业根基和周人文化印记	(34)
二 《尚书》的宗法色彩和史官制度印记	(38)
三 《尚书》祖先崇拜和“先王”思想印记	(41)
第二章 《尚书》编纂中的华夏历史意识	(43)
第一节 “四代”观念与华夏历史意识	(43)
一 “华夏历史意识”相关研究成果	(43)
二 先秦古籍的“四代”“三代”意识	(45)
三 华夏历史意识的成因和影响	(51)
第二节 《尚书》历史记录与“大一统”政治观	(56)
一 《尚书》所载时代的政治状况	(56)
二 《尚书》历史记录表现的“大一统”政治观	(60)

三 《尚书》“大一统”政治观产生的基础	(66)
第三节 《尚书》“大一统”观念的展开	(68)
一 《春秋》及《公羊传》的“大一统”观念	(69)
二 《世本》《竹书纪年》的“大一统”观念	(71)
三 《史记》及中国通史思想之萌芽	(73)
第四节 《尚书》华夏历史意识与“华夷之辨”	(74)
一 《尚书》“华夷”观念的独特内涵	(74)
二 《尚书》“华夷”观念的成因	(82)
三 《尚书》“华夷”观念的历史影响	(86)
第五节 华夏历史意识、“一元”史观及现代民族意识	(88)
一 与华夏历史意识相关的观点	(88)
二 文化在民族意识形成中的作用	(89)
三 中西民族意识的不同文化背景	(94)
四 华夏历史意识的影响和价值	(98)
 第三章 《尚书》“天人”历史观念	(100)
第一节 《尚书》论“天”及“人”	(100)
一 《尚书》天人观念之体现	(101)
二 《尚书》“天”之特性	(103)
第二节 《尚书》天人关系论	(107)
一 《尚书》天人观念的演变	(108)
二 《尚书》天人关系的特点	(108)
三 《尚书》天人观念的成因	(118)
第三节 《尚书》历史本原思想	(119)
一 《圣经》“历史神创”论	(120)
二 《尚书》“历史非神创”思想	(120)
三 《尚书》“历史非神创”思想的成因	(123)
第四节 《尚书》历史主体思想	(126)
一 历史是“人”的历史	(126)
二 历史是“所有人”的历史	(128)
第五节 《尚书》天人观念与春秋战国人文思潮	(129)
一 《尚书》:先秦天人观念的文献源头	(129)

二 《尚书》天人观念对春秋战国时期人文思潮的影响	(131)
第四章 《尚书》历史变动思想	(136)
第一节 《尚书》“稽古”观念与历史因革论	(136)
一 《尚书》历史连续观念之体现	(137)
二 《尚书》历史连续观念的影响	(143)
第二节 《尚书》“革命”论与循环史观	(145)
一 “革命”论与《尚书》	(146)
二 《尚书》“革命论”的内涵及成因	(149)
三 《尚书》“革命论”的重大影响	(151)
四 “革命”与“禅让”	(153)
五 《尚书》循环史观的内涵及成因	(154)
六 辩证看待《尚书》循环史观	(157)
第三节 《尚书》历史变动思想的两重性视角	(159)
一 《尚书》对新旧时代嬗变的态度	(159)
二 《尚书》对往昔圣王时代的追慕	(162)
三 《尚书》历史变动观念的两重性视角	(165)
第四节 《尚书》《周易》历史变动思想比较	(167)
一 《尚书》《周易》历史变动观念的相通性	(167)
二 《尚书》《周易》历史变动观念的相异点	(171)
三 《尚书》《周易》历史变动观念的影响	(172)
第五节 《尚书》历史变动思想与先秦诸子历史变动观	(173)
一 《尚书》与儒家诸子历史变动观之关系	(174)
二 《尚书》与老庄历史变动观之关系	(179)
三 其他诸子历史变动观念与《尚书》	(180)
四 “通变”的影响与儒家的中庸	(183)
第五章 《尚书》历史功用思想	(185)
第一节 《尚书》“忧患”意识	(185)
一 “忧患”意识源于《尚书》	(186)
二 “忧患”意识是一种历史意识	(187)
三 《尚书》“忧患”意识的体现	(189)

第二节 《尚书》“殷鉴”思想	(192)
一 《尚书》“殷鉴”思想内涵及价值	(192)
二 “殷鉴”思想的基石	(195)
三 “殷鉴”的目的	(200)
第三节 《尚书》“先王”观念	(204)
一 《尚书》“先王”观念与历史意识	(204)
二 “先王”观念的成因和实质	(206)
三 “先王”观念的影响	(209)
第四节 《尚书》与“资治”思想	(212)
一 “资治”思想的发端与内涵	(212)
二 “资治”思想产生的基础	(215)
三 历史功用思想与“资治”思想的价值	(217)
 第六章 《尚书》其他历史思想	(220)
第一节 《尚书》对杰出人物历史作用的想法	(220)
一 《尚书》中的“圣王”形象	(220)
二 《尚书》中的“贤臣”形象	(226)
三 《尚书》历史杰出人物的特质	(228)
四 《尚书》对杰出人物历史作用的想法	(230)
第二节 《尚书》家族历史思想	(232)
一 《尚书》“福善祸淫”的家族历史思想	(232)
二 《尚书》后嗣观念的特质	(236)
三 后嗣观念与历史意识	(239)
第三节 《尚书》历史审美思想	(241)
一 对人之品德的赞美	(242)
二 对人之功业和力量的审美	(244)
三 对历史之功用的审美	(246)
 第七章 《尚书》历史思想的影响和当代价值	(249)
第一节 《尚书》历史思想的影响	(249)
一 对中国历史思想的影响	(250)
二 对中国文化整体的影响	(252)

第二节 《尚书》历史思想的当代价值	(254)
一 应重新评价《尚书》的价值	(254)
二 《尚书》历史思想的当代价值	(256)
 结语 《尚书》历史思想的特点	(258)
一 “王道”思想色彩	(258)
二 实用理性主义色彩	(258)
三 强调历史主体的统一性、和谐性	(259)
四 基于道德和社会变动的两重性视角	(260)
五 “民本”特色和宗法色彩	(260)
 参考文献	(262)
 附录一 儒家后嗣观念对历史意识、宗教意识的影响	(291)
 附录二 经史分途的“文化层级”和“身份选择”意识	(299)
 附录三 《尚书》的教育思想及其价值	(309)
 后记	(316)

绪 论

《尚书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文献汇编。它所记载的时代，起于传说中的尧、舜、禹时期，终于东周的秦穆公时代。《尚书》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地理等各个方面，但主要是各种文告和君臣们讨论政事的记录，所以，它被视为治国政典；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，它是古代史官记录史事的遗留，因而又是中国最早的史籍。

《尚书》的突出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。第一，从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而言，作为中国史书的滥觞，《尚书》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根基，形塑了其基本面貌，涵盖了其基本主题。第二，从对中华民族影响的广度论，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典之一，《尚书》既曾高居庙堂之上，被最高统治者奉为治国圭臬、皇皇政典；又能深入草野之中，作为古代庠序中地位尊贵的教材，广为士子们讽诵研习。因而，《尚书》的影响辐射到各个社会阶层。第三，就对中华文化影响的深度来看，《尚书》是中国原生本土文化的第一次凝聚成书^①，是此前文化成果的“集大成”，堪称“元典中的元典”；^②内涵丰厚，思想深刻，中国古代几乎所有典籍、学者都难以绝对摆脱它的思想影响。在某种意义上，《尚书》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。群星灿烂的中国春秋战国文化，其实也不是无源之水，而是对包括《尚书》在内的中国早期文化成果的继承和发展。

正因为如此，广义上的《尚书》研究历来是中国学术史的重要内容。在《尚书》诸多思想领域中，历史思想是一大重镇，对后世的影响尤其

^① 夏鼐先生说：“我以为中国文明的产生，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……中国虽然并不是同外界隔离，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。”参见夏鼐《中国文明的起源》，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100页。

^② 张富祥：《〈尚书〉概说》，载郑杰文、傅永军主编《经学十二讲》，中华书局2007年版，第114页。

深刻和广泛。因此,《尚书》历史思想研究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重要方面。

按一般习惯,今本《尚书》可分为“今文”“古文”两部分。^①关于《尚书》各部分、各篇的成书年代和真伪,历来有不同看法,甚至存在着激烈争论,迄今仍然如此。然而,回答好这两个问题,又是从事《尚书》研究的前提。因此,首先要进行必要的说明和界定。

一 《尚书》文献源流简述

作为我国最早的文献汇编,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,《尚书》从记录成篇到汇集成书,绝非一朝一夕,而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流传和不断的整理。一般认为,《尚书》最初的篇目应该远不止目前的篇数,可能有数千篇之多。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,在流传过程中逐渐佚失,数量才大为减少。^②历史上曾流传过孔子“删《书》”的说法。但是,《尚书》学家刘起钊先生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可信——因为,据文献记载,孔子在世时,就一直慨叹文献不足,他努力保存和搜集文献还来不及,哪里还会去“删《书》”?^③刘先生的推断很有道理。不过,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关键性人物,孔子确曾编纂、整理过《尚书》,这也是可以理解和有一定依据的。由于《尚书》的崇高地位和巨大价值,在先秦时期,不只是孔子曾经研读和整理过《尚书》;诸子百家学派、各文籍几乎都曾引用过《尚书》,其中以墨、儒两家最为突出。据统计,儒墨两家著作引用《尚书》各高达数十次之多。^④

不幸的是,后来由于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,“焚书”时又把《尚书》

① “今文”和“古文”,是指文字书写系统的不同。下文有较为详细的解释。

② 刘起钊先生说:“《尚书》篇数原来很多,达数千篇,后来损失了很多,到春秋战国时剩下不过百来篇,则这是合于事实的。”参见刘起钊《〈尚书〉源流及传本考》,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,第4页。

③ 刘起钊:《尚书学史》(订补本),中华书局1989年版,第12页。

④ 刘起钊先生曾经按“今文二十八篇”“古文十六篇”“书序中余篇被引者”“先秦逸书逸篇”“引书、某书、某句、逸句”五类统计过引用情况,然后再合出总数,甚为详尽。其中,儒家中仅《孟子》就引用38次,《荀子》22次;《墨子》达47次;以文籍论,《左传》达86次之多,《礼记》亦达43次。参见刘起钊《尚书学史》(订补本),中华书局1989年版,第11—66页。另,陈梦家先生也曾经作过统计,但不如刘先生所采文籍全面。参见陈梦家《尚书通论》(外二种),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,第8—37页。

《诗经》列在首要的地位，并且下令民间不得私藏，因此《尚书》遭受一大劫难，篇目损失很多。延至西汉初期，古代学术文化重新受到重视，西汉朝廷下令征求古书，但是济南儒生伏生所献出的“今文”《尚书》已经只剩下烬余二十八篇（一说二十九篇），即伏生本“今文《尚书》”。^①从刘起钊先生统计的《尚书》在先秦时期被引用的情况，伏生本《尚书》当时是流行最广的。^②而在汉代，它也最受重视，是官方承认的定本。汉武帝年间，又发现了用所谓“古文”写成的另一个《尚书》版本。这个版本，比伏生本“今文《尚书》”多出十六篇，但是它流传并不广，尤其是多出的十六篇甚至无人说解。

后来，由于西晋“永嘉之乱”，最为通行且得立于学官的伏生本“今文《尚书》”失传，后出的“古文《尚书》”十六篇亦去向不明。到了东晋时期，梅赜又献出“孔传古文《尚书》”，共五十八篇，由于篇目分合的差异，实际比伏生本《尚书》多出二十五篇。梅赜所献的这个版本，经过后世学者注疏、“音义”后，唐初孔颖达等人又进一步据此撰成《尚书正义》，经官方颁布，成为《尚书》标准本。到清代，《十三经注疏》也采用了《尚书正义》本。从此，《十三经注疏》中的《尚书正义》一直流传至今，成为最通行的版本。^③

《尚书》复杂的流传经历，加上古代典籍保存条件的限制，都必然给其文本的真伪问题带来严重困扰。有关的争论，其实自先秦时代就有萌芽，^④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里，几乎从未止息过。尤其是《尚书》“今古

① 因其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体文字即“今文”写成，故称“今文《尚书》”；相对“今文”而言的书体“古文”，则各学者说法有差异，刘起钊先生认为“是指秦统一为小篆以前的大篆籀文和六国使用的文字”（参见刘起钊《尚书学史》（订补本），中华书局1989年版，第105页）。“今文”“古文”实即书写文字体系之差异。

② 刘起钊：《尚书学史》（订补本），中华书局1989年版，第62页。

③ 以上所述《尚书》源流，主要参考了以下论著：周秉钧：《白话尚书》，岳麓书社1990年版，前言第1—3页；张富祥：《〈尚书〉概说》，载郑杰文、傅永军主编《经学十二讲》，中华书局2007年版，第89—103页；刘起钊：《〈尚书〉源流及传本考》，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4—55页；张富祥：《古文〈尚书〉辨伪方法异议》，载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籍文献研究所编《古籍整理研究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2009年，第355—373页。拙作关于《尚书》的源流等问题（尤其是一些常识性问题），多综合采用以上论著的观点；至于一些需要辨明的观点，则尽量择善而从，但限于水平，未必妥当。

④ 张富祥：《古文〈尚书〉辨伪方法异议》，载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籍文献研究所编《古籍整理研究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2009年，第355页。

文”之争，争辩极为激烈，几乎贯穿整个《尚书》研究史，余波至今不平，甚至不时掀起新的波澜。

包括《尚书》在内的经学“今古文”之争，正如张富祥先生所说，“原是由于抄传经本的字体引起的，而经本的用字及解释不同，学术上的争议自不可避免。”^①但是，由于“今文”和“古文”各有其不同的传授系统，在非常重视“师传”和“家传”的古代，就难免因产生歧解而发生争论；更加之，后来在治学异见中掺杂政治因素以及功名利禄等利害关系，使得包括《尚书》学在内的经学“今古文”之争一度非常激烈。

历史上，《尚书》“今古文之争”的基本态势大致呈现以下此消彼长之情形：

起初，由于出现和立于学官时间早、人多势众，“今文”《尚书》学在西汉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垄断地位。至西汉末年和王莽新朝时期，刘歆得到王莽的帮助，“古文”《尚书》也被列入学官，颇有兴旺之象。但是，随着东汉的建立，“古文”《尚书》又被取消于学官并从未再被立过。虽然如此，由于自身的种种巨大缺陷，^②“今文经学”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鄙视而日逐式微。相应地，包括“古文”《尚书》学在内的“古文经学”却逐渐受到重视，研习者日众。到东汉后期，郑玄兼采今、古文，集“古文”学之大成，遍注群经，而包括《尚书》学在内的“古文经学”因而独盛；而魏晋至唐代，梅赜“古文”《尚书》出世后又一直占据正统地位并流传至今。^③然而，对此版本的质疑，也是代有其人。

以上是对《尚书》文献源流尤其是《尚书》“今古文”之争的简单回顾。长期以来，“《十三经注疏》本”《尚书》一直是最有权威和影响力的版本。尽管不断有人对其中的“古文”部分甚至某些“今文”篇章提出质疑；然而，“古文”和“今文”部分，在目前仍在事实上共同构成《尚书》思想研究的文本基础。由于《尚书》版本源流的特殊性，有必要

① 张富祥：《〈尚书〉概说》，载郑杰文、傅永军主编《经学十二讲》，中华书局2007年版，第98页。

② 比如，今文经学逐渐变异为功名利禄的敲门砖，今文经学经师队伍的某些腐败现象，经书解释的繁冗和今文经学中的谰纬迷信色彩，等等。

③ 以上所述今古文之争，主要参考以下论著：张富祥：《〈尚书〉概说》，载郑杰文、傅永军主编《经学十二讲》，中华书局2007年版，第98页；刘起钎：《尚书学史》（订补本），中华书局1989年版，第114、137—156页。

对今本《尚书》各篇著作年代及可信度进行分析，作为拙著论述的依据。下文针对今本《尚书》亦即通行之“《十三经注疏》本”的篇目，对其文献性质逐次说明。

二 今本《尚书》文献界定

今本《尚书》（以最为流行的“《十三经注疏》本”为据）共五十八篇，按照年代先后顺序，分为四个部分，包括“虞书”五篇，“夏书”四篇，“商书”十七篇，“周书”三十二篇。至于“虞代”，向来就有“虞、夏同科”^①之说，因而有将“虞书”和“夏书”合二为一之做法。其篇目构成，按张富祥先生的说法是：

今本《尚书》仍为五十八篇，其中三十三篇与马、郑、王注本同，而另外多出二十五篇。所谓三十三篇，实指伏生本的二十九目，因从《尧典》分出《舜典》，从《皋陶谟》分出《益稷》，又分《盘庚》为三篇，故实有篇数为三十三。所谓二十五篇，是指……郑玄《书序》的古文二十四篇，移出《舜典》、《益稷》入三十三篇之数，又置换其中的十三篇，再加《泰誓》三篇，即成二十五篇。《舜典》篇的分出，可能在马、郑、王注本中已然，未必是东晋初梅賾献书时所^②。

以上是就今本《尚书》的篇目来源而言。如果从《尚书》书写的文字系统看，又可将今本《尚书》文献划分为“古文”和“今文”两大部分。今本中所谓“古文《尚书》”，即东晋梅賾“献《书》”后多出的二十五篇。除了二十五篇后出“古文”部分外，余下者即“今文《尚书》”，基本上就是指在“秦火”之后，由儒生伏生传授下来的、用汉代

① 所谓“虞、夏同科，虽虞事亦连夏”，见（汉）孔安国传，（唐）孔颖达等正义：《尚书正义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标点本（简体字版），第20页。由于拙著引用《尚书正义》的次数繁多，故以下凡引自《尚书正义》的文字，均简注为“《尚书正义》”及其页数，而不再一一详细注明责任者、出版社和出版时间。

② 张富祥：《〈尚书〉概说》，载郑杰文、傅永军主编《经学十二讲》，中华书局2007年版，第103页。

通行的隶书写成的二十八篇（或言二十九篇）《尚书》；这部分在今本《尚书》中又被多拆分出五篇，故目前总数为三十三篇。

首先，今本的“今文《尚书》”部分，一向被认为较“古文”部分更可信，因其基本上就是汉初伏生所传《尚书》的内容，具有文献依据，受到学者们认可。顾颉刚先生在给胡适的《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》一文中，曾把《今文尚书》二十八篇分成三组：第一组，包括《盘庚》《大诰》《康诰》《酒诰》《梓材》《召诰》《洛诰》《多士》《多方》《吕刑》《文侯之命》《费辞》和《秦誓》十三篇，认为它们在思想和文字上都可信为真；第二组，包括《甘誓》《汤誓》《高宗彤日》《西伯戡黎》《微子》《牧誓》《洪范》《金縢》《无逸》《君奭》《立政》和《顾命》十二篇，他断定这部分应该为东周期间的作品；第三组包括《尧典》《皋陶谟》和《禹贡》三篇，他断定为战国到秦汉间的作品。^①可见，即使以认定标准较为严格的、以“疑古”著称的顾先生之眼光，仍至少承认今文《尚书》中的近一半（今文的“周书”部分再加上《盘庚》三篇）“在思想和文字上”都是可信的，其他的今文部分则成文较晚些，可能掺入一些后人的东西。

顾先生弟子刘起钊先生则与顾先生稍有不同。除赞同顾先生对前两组的判断外，刘先生又进而认为，《尧典》《禹贡》和《洪范》三篇也并不一定是战国到秦汉间的作品。刘先生认为：《尧典》应该成书于春秋孔子时，只是到后代掺入了秦汉时期的东西而已；而《禹贡》应该是西周王朝史官所作，也是到战国时不免加入一些当时的资料；至于《洪范》，则是“在商、周奴隶制盛世传下来的统治经验，到春秋之世应当时统治者的需要而整理加工编成的”。^②概言之，刘先生认为以上三篇的年代并非如顾先生所言那样晚，因而其基本材料也大致可信；当然难免后人有意无意阑入的东西在内，因而稍显“失真”。刘先生从《尚书》原文来历和流传过程两个方面着手，对今文《尚书》进行区分和研究，这种历史的观点是较符合实际的。蒋善国先生则从情理上推断说：“就西晋末年《尚书》流传的情形看，不容伪《孔传》在今文二十八篇（去《太誓》计算）经文里面作伪，并且也没有作伪的必要。因此，我们很可以根据这

① 顾颉刚等：《古史辨》（第1册）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71—172页。

② 刘起钊：《尚书研究要论》，齐鲁书社2007年版，第173、185、419页。